

玄奘西行东归： 铸就中外文化交流史一座丰碑

□ 孙明霞

2014年3月，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这样评价玄奘法师，“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，历尽磨难，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”。玄奘法师穿越八百里流沙，途经七十余国，历时17年从印度取回佛经，又耗费19年翻译经典。后人根据他的传奇经历，演绎出一部妇孺皆知的《西游记》。其实，玄奘的真实经历，远比《西游记》更为精彩动人。

玄奘西行

读过《西游记》的人都知道，玄奘被唐太宗敕封为“御弟”，奉旨前往西天取经。然而，小说的演绎与真实的历史大相径庭。事实上，玄奘的取经之路始于偷渡边关。当时李世民刚刚登基，贞观之治尚未到来，整个大唐弥漫着“国政尚新，疆界不宁”的气氛。北方突厥的颉利可汗一度屯兵十万，直逼长安，幸亏李世民单骑劝退。一心备战的朝廷担心壮劳力外流而兵源不足，因而颁布“禁边令”。在此情形下，玄奘西行求法的出境申请并未得到官方批准。

于是，玄奘只能选择偷渡。实施“禁边令”的第二年，长安周边发生霜冻饥荒，朝廷允许长安百姓外出逃荒。玄奘混入人群，离开长安，直抵边关。由于私自偷渡，玄奘曾经一度被官府遣返原籍，甚至被通缉追捕。在瓜州，他结识了一位名叫石磐陀的胡人。石磐陀愿意追随玄奘西行，还请法师为他摩顶受戒，由胡人变为胡僧。“胡僧”与“獼猴”发音相近，这位石磐陀正是孙悟空的原型。小说里的悟空空力保唐僧，然而现实中的石磐陀却半途而废，因为他担心自己受到玄奘的牵连因偷渡而获罪。

纵然孤身一人，玄奘义无反顾地向西前行，因为他有自己一直以来的信念。自孩提时代起，玄奘就立下“远绍如来，近光遗法”的弘誓大愿。但他发现，由于译本参差不齐，人们对佛教的理解莫衷一是。好在玄奘所处的长安是当时的“国际化大都市”。外商辐辏、胡姬当垆、番僧云游，都是长安街头的寻常景象。其中一位印度高僧给玄



奘指点迷津，让他前往印度那烂陀寺求真经。从此，玄奘确立“誓往西方遵求遗法”的信念。

正是这一信念，支撑着玄奘的壮志苦行，“终不东移一步以负先心”。一路上，穿越黄沙漫漫，翻过雪山皑皑，玄奘靠的是意念。比自然地理更为凶险的是政治的匡测，他随时会被卷入沿途各国的权斗旋涡和教派冲突，玄奘靠的是智慧。比政治纠缠更为难挨的是心灵折磨，未知的旅途和无尽的寂寞，无时无刻不在侵蚀内心世界，玄奘靠的是信仰。“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安。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后者安知前者难。路遥碧天唯结冷，砂河蔽日力疲殫。后人如未谙斯旨，往往将经轻易看。”这正是玄奘求法的真实写照。

历经艰险，玄奘终于如愿。他迈入印度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，求教戒贤法师。学成之时，戒日王在全印度组织5年一度的辩经大会。东土而来的外来和尚却在佛教发源地大放异彩，整整18天竟然无人能够驳倒玄奘。从此，他被大乘教派誉为“大乘天”，被小乘教派誉为“解脱天”。当年的偷渡客，最终成为“最牛留学生”。

玄奘东归

无论走得有多远，玄奘从来都没忘记自己为何出发。无论印度的权贵高僧如何挽留，玄奘还是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乡的旅途。西天取经的道路固然不易，东归大唐的旅途也不平坦。毕竟，玄奘背负着“偷

渡出境”的罪名。当玄奘走到于阗国时，他上书朝廷，投石问路。他坦承当年“冒越宪章，私往天竺”，也表达了自己游子还乡的愿望。在忐忑不安中，玄奘等来了唐太宗的敕令，“闻师访道殊域，今得归还，欢喜无量。可即速来，与朕相见”。

大唐包容玄奘，玄奘也回馈大唐。玄奘回国后，完成了4项重要工作：一是耗时19年，组织专门力量，翻译大量佛经；二是引进印度佛教，创立法相唯识宗；三是把《道德经》等中华经典译成梵文，向西域传播中华文化；四是应唐太宗的要求，口述西行见闻，形成《大唐西域记》。

对唐朝而言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是打通西域丝路的战略指南。自汉王朝消亡以来，疆域广袤的大唐再次把目光投向西域。雄才大略的唐太宗渴望恢复丝绸之路的历史荣光。唐太宗迫切需要了解西域境况。玄奘熟谙西域各国的地理条件、政治制度和风土人情。于是，由他口述的《大唐西域记》也就成为唐太宗“睁眼看西域”的第一手资料，这为唐朝重新恢复陆上丝路直接奠定了知识基础。

对印度而言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是重建印度历史的考古手册。由于印度没有完备的史料记载，以至于1837年英国人在印度挖掘出古代遗址后不知其为何物。正是依靠翻译成法语、英语的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人们才意识到，这片遗址正是印度历史上大名鼎鼎的鹿野苑。人们在那里发现了“阿育王石柱”，今天

印度国徽上的狮子柱头便源于此。人们还根据玄奘的记载，挖掘那烂陀寺等重要遗迹，再现孔雀王朝的历史记忆。有位印度人这样说，“玄奘依然活在每一个印度人的心灵深处，倘若没有他字字珠玑般的著作，我们印度的历史就不会完整”。

对中亚而言，《大唐西域记》是了解中亚地区的宝贵史料。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，中亚地区是希腊文明、伊斯兰文明、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的交汇地带。在这片舞台上，文明的交融固然不绝如缕，但是彼此的争斗也很频繁。由于战争频仍、民族迁徙、环境恶劣，中亚地区留下的史料极为稀少，因此《大唐西域记》弥足珍贵。凭借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，玄奘的影响力不再局限于佛教界，而是辐射到整个中外文化交流史。

玄奘现象

玄奘法师的西行东归，铸就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，引发后人无数评说。弟子们说他是“佛宗之法将”，鲁迅称他是“中华民族的脊梁”，梁启超尊他是“千古之一人”。人们都在礼赞玄奘精神，却很少论及“玄奘现象”。所谓“玄奘现象”，即中国历史上不乏西天取经，却鲜有传经送宝。在历史上，即使是国力显赫的大唐盛世，中国只会欢迎日本遣唐使来华学习，却不会强迫日本接受中华文化。

“玄奘现象”蕴含着中华民族“有闻来学，未闻往教”的文明基因。中华民族不搞意识形态输出，这是由中华文明的地理依赖性所决定的。家庭观念是中华文明核心理念，所以中华文明始终立足本土，依托家乡，形成了以家庭为中心的“同心圆结构”，此即中华文明所独有的地理依赖性。这种地理依赖性，也造就了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的文明性格。

“玄奘现象”不是历史的偶然，而是文明的必然。正因为“有闻来学，未闻往教”的文明基因，中华民族既有文化自信的从容底气，更有兼容并蓄的开放胸怀，也乐于接纳域外文化。这便是中国胸怀。

《史记》是二十四史之首，五帝本纪又居《史记》之首，因此，五帝本纪对中华文化、中华文明来说意义重大。近年来，一大批富于生命力、想象力、震撼力的新石器时代重大考古发现，与古文献相印证，有力证明了五帝本纪记载的史料，体现了分工细化、国家形成、文明发展、文字成熟的基本过程，也充分证明司马迁在考辨、采用史料时博综兼览、实事求是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实际上记载了七位上古帝王，在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之外，还有神农氏和大禹。由于神农氏衰落，黄帝取代神农氏成为天下共主。神农氏之名凸显了农业的重要性，而农业是国家形成的经济基础。黄帝时期，采铜业、铸造业等手工业取得长足进步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《史记·孝武本纪》均记载黄帝采铜铸鼎的事迹。在旧石器时代，砾石——石片工业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占主导地位；大约一万年前，制陶业兴起；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，中原核心区进入铜石并用时代，黄帝采铜铸鼎的事迹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。大舜时期，手工业已经十分繁盛，出现了“垂主工师，百工致功”的现象，与此相对应，山西陶寺遗址发现大量具有王者之气的精美手工业产品。在社会分工细化的基础上，城乡差别进一步扩大，大城市开始兴起，“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”。考古发现，距今5000多年的双槐树遗址、焦家遗址、岗上遗址等都是规模巨大的都邑性遗址，而龙山文化时代诸城林立，选址规划科学，布局结构完备。

考古学证据显示，浙江余杭良渚遗址、山西襄汾陶寺遗址、陕西神木石峁遗址、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等，均已在当时进入早期国家阶段。河南双槐树遗址发现的巨大城址、宏大建筑、礼制文明、鬯丘天坛、王陵兆域、北斗九星、丝绸农桑、世俗社会等，远远超出了司马迁对黄帝时代“时播百谷草木，淳化鸟兽虫蛾，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金石玉”的描绘，被考古学家称为“河洛古国”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记载“禹、皋陶、契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龙、傒、益、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，未有分职”，说明当时国家机器对简单。随着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，国家机器承担的管理事务愈益繁重，舜对国家机器进行了分工，国家管理职能进一步完善，“皋陶为大理，平，民各伏得其实；伯夷主礼，上下咸让……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”。

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认为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，而大舜以孝悌闻名于世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在篇幅不多的情况下，详细记载了大舜面对父顽、母嚣、弟傲以及帝尧种种考验时的应对，彰显了以“孝悌”为核心的“父义、母慈、兄友、弟恭、子孝、臣忠”的价值观。这些价值观是农业社会的产物、农业文明的结晶，成为后世儒家学说的源流，并被发扬光大，尧舜禹也因此成为孔子、儒家、中国传统社会最为推崇的上古圣王。农业社会毫无例外都是父权制社会，而历史学家杨向奎认为有虞氏已经确立了父系家长制。考古学证据显示，至迟到黄帝时期，中国的主要文化中心

考古实证《史记》中的 上古发展史

□ 隋云鹏

已经进入农业社会、父权制社会。

从文字考古看，最早明确出现上古帝王的出土文献是西周中晚期的遂公盃，但其溯及的上古帝王仅有大禹，遂公盃铭、毕加编钟铭、秦公簋铭、叔夷钟铭，均为春秋中晚期涉及“禹”“夏”的铭文；战国初期铜器陈侯因兹敦铭文出现“高祖黄帝”的文字；陶寺遗址陶扁壶朱书文字，其中一个学术界公认为“文”，另一个被释读为“易、尧、邑、命、唐”等，当与帝尧或大禹有着密切的关系。考古发现，山东莒县陵阳河及大朱家村大口尊、安徽蒙城尉迟寺大口尊、山东宁阳于庄大口尊等都出现了相同的文字“𠂤”，这个文字被释读为“昊”，与太昊氏、少昊氏可能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从贾湖遗址、双墩遗址刻画符号，到大汶口文化、马家窑文化、良渚文化、丁公龙山文化陶器刻符，在结体和书写风格上越来越成熟。从文字发展规律看，随着文字逐步积累，语言逐步丰富，史料也会逐步增多。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，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关于帝尧的记载，篇幅有了很大的增加，而《尚书》也是从《尧典》开始。《论语》专门设有《尧曰》篇。孔子认为帝尧时期已经“焕乎其有文章”。《尚书》中说：“惟殷先人，有册有典”，殷卜辞不仅证明殷人有册有典，而且证明了《史记·殷本纪》关于殷王的世系基本可靠，从而为《史记》关于夏代及之前相关史料记载的可信性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
从考古看文明

雅典大瘟疫对希腊历史的影响

□ 曹颖新

COVID-19 病毒在全球的大流行，引发了人类对传染病的关注。历史上重大传染病到访之时，许多历史进程就此被中断、打乱，或被引向另外的方向。这种意外性和连锁效应，在西方历史早期的“雅典大瘟疫”中就显现了出来。

一

“雅典大瘟疫”被视为人类历史上十大瘟疫之首。这场瘟疫被严肃的正史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较为客观地记录下来，使得后世的人们可以把这场瘟疫视为信史，来思考瘟疫与战争、政治和人类社会各方面的关系。如果把这场瘟疫作为一个聚焦点，把镜头稍稍拉远，来观察整个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话，会发现瘟疫是影响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公元前431年，提洛同盟首领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首领斯巴达在长期的不睦之后，终于因为某个事件撕毁了之前订立的和平条约。斯巴达国王阿基达马斯率军长途远征，侵入了雅典控制的领地阿提卡。雅典首领伯里克利早有准备，他经过分析，认为雅典有足够的财政储备、军事资源和外交优势，以此来迎战斯巴达。而且，根据斯巴达陆地作战较强而雅典航海作战较强的对比，他还制定了战略，即在陆地上以守为主，在海洋上主动出击。之后，他发挥了多年来广场政治训练出来的演讲能力，劝说很多雅典城邦的人从郊外搬到雅典城里居住，准备到

斯巴达军队兵临城下之时，雅典人可以坚守不出，直到耗尽敌人的资源为止；同时筹备海上作战，雅典的庞大舰队可以巡航伯罗奔尼撒半岛，沿线攻占对方同盟的要塞，最后长驱直入，占领斯巴达空虚的后方。

雅典城邦以雅典城市为中心，周边分散着众多独立的市镇和乡村，这些构成了亚狄迦地区。亚狄迦人在政治身份上是雅典公民及其非公民的家人。对于搬家的动员，世代居住在郊外的亚狄迦人是极其不愿接受的。就连在希波战争时期，他们也没有离开家园和他们的神庙，但他们认可一个共同体的理念，即他们都是雅典人，应该为了城邦的荣誉而战。为了迎战斯巴达，他们听取了伯里克利的劝说，举家搬到了雅典城内，很多人只能住在仅可以避风挡雨的屋檐下，有的人还栖居在神殿下。城中一下子搬来了很多人口和牲畜，城市的排水系统压力激增。尽管居住条件很恶劣，但大家都聚集在一起，准备坚守不出了。由于斯巴达军队在沿途耽误了

时日，这为雅典人赢得了时间。在搬迁的同时，雅典的30艘舰船也开始南下，开往伯罗奔尼撒半岛。由于雅典人不与斯巴达人正面交锋，斯巴达军队没有得到与雅典军队大范围交战的机会，无法发挥其陆地作战的优势。伯里克利的战略收到了预期效果，斯巴达人逐渐耗尽补给，没有占到便宜，反而是雅典的舰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岸攻城拔寨，还与整个希腊的劲敌色雷斯和马其顿订立了同盟，解除了北方的隐患。以骁勇好战闻名的斯巴达军队，浩浩荡荡而来，却无从得手，他们就在雅典周边的平原进行抢掠活动，但是并没有实质性的收获。

二

就在雅典看起来胜利在望之时，一场瘟疫爆发了。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，瘟疫起源于上埃及，经过下埃及和利比亚，在战争第二年（公元前430年）的夏天，瘟疫传到了雅典。

据医史学家考证，这次疫病可能是斑疹伤寒，也可能是天花，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。感染的人极其痛苦，症状表现为发烧、呕吐、极度亢奋，有的人因高热而死，有的人因强烈的腹泻而死，有的人熬过去这个阶段，但是得了坏疽，导致失明或残疾。幸亏于难的人发现自己有了免疫力，不会再发作，而亲人离去给他们带来很大痛苦。修昔底德自己也被感染了，不过所幸他活了下来，否则就没有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》这部史学名著了。他是一位坚持用事实写作的人，但是面对这场瘟疫，他也开始思考超自然的力量，他怀疑是希腊神祇的意志使然，众神站在了斯巴达一边，而雅典的守护者雅典娜这次要黯然神伤了。

修昔底德的想法在雅典人中并不在少数，这场瘟疫一下子打击了雅典的势头，人们开始厌战，把罪责归于伯里克利。这位战时的英雄，现在成了被声讨的对象。但是伯里克利不顾雅典人的反对，坚持要继续这场战争，他亲自率领100艘战船开往斯巴

达，攻取了一些城邦。就在他们顾忌雅典后方危险之时，却发现在亚狄迦的敌人撤军回国了。因为此时斯巴达人得知了雅典城内大瘟疫的消息，判断瘟疫比敌方军队可怕得多，于是迅速撤离。

就这样，双方陷入了僵局，在之后的数年间，双方互有胜负，但没有哪一方取得压倒性优势。这种胶着的局面与瘟疫有很大关系。瘟疫在军队中中度暴发，削弱了双方的战斗力；瘟疫也在民众中蔓延，引发了不满情绪，造成两个同盟中各自纷纷爆发革命，拆解着同盟的合力。

三

如果把镜头再拉远一些，把雅典大瘟疫放在古希腊历史中去看，又会有一番体会。伯罗奔尼撒战争其实是一场争夺希腊霸权的战争，但当大瘟疫来临之时，雅典最要紧的应是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救治病人，迅速与斯巴达停战，把精力转到城内，这是雅

典多数人的愿望；而从敌方的反应来看，斯巴达遇到瘟疫时也很害怕，当时就撤军回国了，所以双方是可以达成和平的。但是以伯里克利为首的军事长官坚持继续作战，军队在他手里，战争一旦开始就很难停下来。

有趣的是，在第一波疫情过去后，雅典人好像又忘了瘟疫带来的痛苦，他们原谅了不久前惩罚过的伯里克利，在他停战整顿的时候，反而要求他再次率军远征。但是，一年之后，就在雅典人再度寻求进攻时，他们的主帅伯里克利也因感染了这种疾病死去。

公元前431—前404年，这场战争时打时歇，希腊多数城邦都卷入其中，当初集体起来打败波斯的那个希腊联盟，在这场战争中走向了衰弱，虽然最后斯巴达赢得了胜利，也建立了它在希腊的霸权，但是并没有给希腊一个光明的结局，战争使得整个希腊内耗殆尽，陷入了更加混乱的状态。这时，北方的马其顿乘虚而入，很快征服了希腊地区，古希腊时代就此终结了。

